

现代性的认知维度

郁振华

《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①是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教授的新著。这部饶有趣味的著作，以哲学的方式讲述一个挪威现代化的故事，探讨了与多元现代性概念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多方面的启示。

在这项研究中，希尔贝克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对挪威的现代化历程加以概念化？他不满足于流行的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老套说辞（混合经济、福利社会等），希望更为深入地理解“斯堪的纳维亚经验”。受韦伯、哈贝马斯的影响，他从合理性的角度切入现代性问题，提出了一个概念框架，以此来刻画挪威的现代化历史。这个概念框架涵盖三种合理性：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解释合理性（interpretive rationality）和论辩合理性（argumentative rationality）。工具合理性以因果说明的科学为基础；解释合理性以神学、法学等旨在理解的人文学科为基础；论辩合理性则不仅体现在各类科学研究中，而且体现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在反思、批判的过程中，追求更好的论证。

以此概念框架来观照挪威现代化的历史，希尔贝克聚焦于两个时期，即1814—1884年的挪威（挪威立国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挪威。有意思的是，在讨论这两个时期时，他都提到了三种合理性的人格化体现，即作为“理想类型”的“象征性行动者”。比如，关于19世纪，他提到了施韦高、莫拉德和温尼耶，分别代表工具合理性、解释合理性和论辩合理性；而在“二战”以后的时期中，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对应的象征性行动者分别是布伦特兰、兰格斯特和夏德瓦姆。虽然此书的重点是挪威历史的这两个时期，但希尔贝克的论述事实上涵盖了整部挪威史。在他看来，挪威现代化经验中的某些特征，可以追溯到维京时代（公元9—10世纪）。

这项研究的结果，是对于现代性之一和多、普遍和特殊，获得了一种比较平衡的看法。希尔贝克认为，对于完整的现代性来说，三种合理性都不可或缺，应该充分展开。他建议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设想抽去与这三种合理性相关的种种设施、技术、建制、实践、文化，会是什么结果？他认为，抽空了这一切，现代人将面对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一个对现代人来说“不可欲”的世界。这是现代性之统一的、普遍的方面。同时他强调，三种合理性的展开，具有不同的时空条件，与各民族根深蒂固的历史经验相联系。比如，斯堪的纳维亚的五个国家，二战时期各自的经历很不一样。这是现代性之多样的、特殊的方面。这本以“多元现代性”为书名的著作，当然强调现代性之“多”的一面，强调斯堪的纳维亚的现代性叙事与主流的英、德、法的现代性叙事的差异，但却没有陷入特殊主义、语境主义，因为作者对于构成现代性之普遍方面的三种合理性，尤其是论辩合理性（特别是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展开）再三致意。这种比较平衡的看法，对于正在展开中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不无启发，提醒我们在强调“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之特殊性的时候，也应看到现代化之普遍的、统一的方面。

希尔贝克在阐述挪威现代化经验时，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挪威的信任文化，即人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官员和民众之间以及政治对手之间的互信。这种互信是历史地形成的。在19世纪的挪威，有两个现代化过程引人注目，一个是由路德宗国家官员（以神学家和法学家为主）推动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一个是由民众运动所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两者的互动，在国家官员和民众之间，在

^① [挪威] 奎纳尔·希尔贝克：《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刘进、王寅丽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此书英文版于201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和英文版相比，中文版增加了一个希尔贝克的思想自述。

政治对手之间，产生了基本的信任。希尔贝克认为，这是挪威平等主义民主的前政治条件。所以，在谈论北欧福利社会时，与一般人仅仅注意其经济方面不同，他特别强调其中包含了“一种以信任和普遍团结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的政治文化”^①。挪威政治的开明进步、社会的稳定和谐是建立在这种信任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反观今日中国严重的信任危机所导致的种种社会病象，更是彰显了挪威现代化经验中信任文化的价值！我倾向于认为，希尔贝克强调的信任文化，属于社会风习的范畴。一个社会之风习，或者醇厚，或者浇薄，或者不厚不薄。对此界分，尽可以作多方面的刻画，但互信之有无、强弱，当是其中较为核心的内容。在一个世风醇厚的社会里，在信任文化的支持下，社会进步事业的展开会比较顺畅，而在一个世风浇薄、互信短缺的社会中，则无疑会艰难得多。

从合理性角度切入现代性研究，不仅有建制分化的问题，而且有认知分化的问题。希尔贝克的研究对后者颇为重视，由此展示了现代性的认知维度。对此，笔者愿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番阐述和发挥。

首先，三种合理性的概念框架预设了一种广义的科学哲学和一种厚实的认识论。工具合理性立足于旨在因果说明的自然科学，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是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解释合理性立足于旨在理解的人文科学，宗教改革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而在19世纪挪威的现代化过程中，神学家和法学家构成了国家官员的主体，因此，希尔贝克特别强调了神学和法学的重要性。在英美哲学中，“philosophy of science”主要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但是在挪威语中，“vitskapsteori”一词则涵盖了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哲学反思，在语义上接近德文“wissenschaftstheorie”，体现了一种广义科学哲学的视野。这种视野在建制层面的体现，就是希尔贝克于1987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创立的SVT（Senter for vitskapsteori，科学论中心）。希尔贝克立足于合理性的不同形式来考察挪威的现代化历程，正是以此广义科学哲学概念为背景的。

希尔贝克认为，合理性是以行动为基础的，是置身于历史中的行动者和建制的，循此思路，他在考察现代性的认知维度时，比较倚重“专长”（expertise）概念。“专长”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认识论概念，说某人拥有某方面的专长，意味着他不仅拥有相关的命题性知识（knowing that），而且具备相应的能力之知（knowing how）。与此相关，希尔贝克强调，不是所有的洞见都是命题性的，有些洞见内在于行动，属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范畴。在此语境中，有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自波兰尼于1958年提出默会知识概念以来，在西方哲学中，主要有三大哲学传统，即波兰尼传统、维特根斯坦传统和现象学传统，介入了对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就默会知识问题上的维特根斯坦式进路而言，卑尔根大学哲学系的约翰内森教授（K. S. Johanessen）堪称领军人物，其原创性的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② 希尔贝克和约翰内森是一个系的同事，几十年来，两人相互支持、相互砥砺，像一对哲学兄弟。希尔贝克对专长和默会知识的强调，明显受到了约翰内森的影响。默会知识概念有强弱之分，强的默会知识原则上不能用命题来充分表达，弱的默会知识事实上未被用命题来表达，但非原则上不能。此处我们聚焦前者，即强的默会知识概念，它包括能力之知和亲知（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两种基本形式。希尔贝克在其思想自述中，强调了游历对于哲学家的重要性。他指出，德文词“Erfahrung”（经验）的字面意思是游历（-fahren）的内在化（er-），就此而言，经验属于个人知识。哲学家通过游历而了解其他传统中的哲学家是如何工作的，由此展开一个反思性的学习过程，这是哲学教养的重要内容。这种由亲历而获得的见识，包含了亲知的成分。默会知识论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亲知和能力之知是命题性知识的基础。因此，若是将英美流行的聚焦于命题性知识的认识论称作“单薄的认识论”，那么，有理由将不限于命题性知识而进一步深深切入亲知和能力之知的认识论，称作“厚实的认识论”。希尔贝克对合理性概念的理解，是与他专长、默会知识、游历的强调相联系的，这些东西都指向了一种厚实的认识论。

① [挪威] 奎纳尔·希尔贝克：《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第74页。

② 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一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在此语境中，值得强调希尔贝克关于专长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会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比如，生态危机。应对这类问题，单一专长完全不敷用，只有多重专长的合作才有希望带我们走出困境。鉴于此，希尔贝克反对某一学科、某一专长的独大，进而强调多学科、多重专长的平衡和合作。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单一专长的独大，不仅在认知上有盲点，在实践上也困难重重。受他的启发，笔者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思想史，那么，近代以来出现的机械主义思潮、生物主义思潮、心理主义思潮，以及这些年来大家谈论的“经济学帝国主义”，都可视为某一学科、某种专长独大的结果。在此理智方向上，对于哲学家来说，以下问题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何谓哲学专长？它在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无疑，这都是些开放性问题。但是，我想，有一点可能大家会有共识，那就是，卓越的概念能力当是哲学专长比较核心的内容。在应对像生态危机这类复杂困难的问题时，哲学家的概念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在应对生态危机时，要摆脱盲目性，必须在全局视野中澄清所牵涉到的各种基本概念关系，甚至像希尔贝克那样，在更为后设的（meta-）层次上，即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来阐明所牵涉到的各种专长之间的关系，反对单一专长的独大，倡导多种专长的合作和平衡等。这样的概念工作，是其他学科、其他专长的经验工作所无法替代的。生态问题是如此，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在应对现代社会种种危机的过程中，凭借卓越的概念能力，哲学家是可以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的。

其次，三种合理性之间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在三种合理性中，前两种合理性构成一个概念对子，它们是目标导向的。工具合理性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其目标是因果说明和技术应用；解释合理性的基础是神学、法学这样的人文科学，其目标是意义理解；第三种合理性即论辩合理性更多地是程序导向的，它贯穿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可以说是前两种合理性的基础。有限的、可错的主体，在批判、反思的过程中，向更好的论证开放，这是论辩合理性的基本规定。那么，在概念上与之相对的是什么呢？构成这种程序导向的合理性之对立面的，一是形而上学的终极真理、绝对知识，一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讨论中，论辩合理性同时反对各类原教旨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

在三种合理性中，论辩合理性无疑是最核心的，因此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阐发。第一，论辩合理性有破和立两方面的功能。消极地说，论辩合理性致力于意识形态批判；积极地说，它力图通过开放、开明的讨论，走向更好的论证。笔者认为，这两方面的功能，可以用夏德瓦姆的一个极富洞见的概念区分来加以说明。夏德瓦姆区分了“überreden”和“überzeugen”。前者是指通过各种操控技巧（如修辞、煽情、威逼、利诱等）来使人折服，后者是指通过有根有据的说理来使人信服。对“überreden”的揭露，属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而“überzeugen”则可视作对论辩活动的正面刻画。因此，对前者的克服和对后者的倡导，都是论辩合理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主体间的信任是论辩合理性的前认知条件。上文说到，信任文化是挪威平等主义民主的前政治条件。我认为，信任不仅在政治上重要，在认知上也很重要。钱锺书说，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可以说，二三素心人构成了一个极简主义版本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商量学问，推进真理。学术的公共品格（communal character），预设了认知者的互相依赖、相互信任。在古今中外那些具有学派特征的学术共同体那里，可以看到一种在独立思考基础上师友切磋砥砺的生动情景。因此，研究者之间的互信和友情，有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可视为论辩合理性的前认知条件。我相信，这一判断无论对旨在因果说明的自然科学，还是对旨在意义理解的人文科学，都是有效的。

再次，从方法论上来说，通过讲述挪威现代化的故事来探讨多元现代性概念，体现了一种实例导向的研究进路（case-oriented approach）。对实例的重视，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运思的重要特征。他有句名言：“不要想，而要看！”^①意思是不要去想抽象的一般原则，而要多看具体实例。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20世纪

① [英]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66节，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60年代,一种被称作“实践学”(praxeology)的思想倾向在卑尔根大学兴起,代表人物是雅可布·梅里(Jacob Meløe)。实践学强调实践之于被动知觉和纯粹认知的优先性,认为人类洞见主要体现在行动中。在方法论上,实践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实例的细致分析。梅里选取生活世界的各类具体例子,比如打铁、摘草莓、劈柴等,来分析人类行动的构成性条件,揭示行动者所拥有的洞见和能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实践学思想在斯堪的纳维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希尔贝克很重视实践学,但他觉得,梅里所选的例子太过琐细,而且因为主要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生活形式而显得有些过时。为了充分展示实践学的概念潜力,他认为应该选一些更能反映现代社会本质的例子来加以考察。在本书中,他所选的例子是挪威现代化的历程。通过对挪威现代化过程的分析,希尔贝克指出,三种合理性的充分展开是现代性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这项研究充分地展示了实例导向的研究进路的概念潜力。

希尔贝克的这项研究,促使我们去思考“讲故事”的方法论意义。以讲故事的方式从事哲学研究,与用思想实验从事哲学研究,都属于实例导向的研究进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进路,有必要区分实例的教学法使用和哲学使用。平时我们在教学中,为了讲清一条原理,经常会举例子,这是实例的教学法使用。但是,实例还有更为积极的作用,可用来获得新的洞见,或用来检验某种洞见,这是实例的哲学使用。^①换言之,在实例的教学法使用中,义理是现成的,而在实例的哲学使用中,义理是有待我们去揭示、阐明的。梅里对打铁、摘草莓、劈柴等实践的细致描述,希尔贝克对挪威现代化历程的讲述,都旨在发明新的义理,是对实例的哲学使用。

总之,立足于三种合理性的概念框架,希尔贝克引人入胜地讲述了一个挪威现代化的故事,进而对现代性之一和多、普遍和特殊获得了一种比较平衡的看法。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概念框架,对于非西方的现代性是否有效,是需要置疑的。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笔者在此只能根据“情景化理性”(situated reason)概念作一个简单的回应。情景化理性概念是起源和有效性、情境性和普遍性、内在和超越的统一:从起源上来说,理性内在于特定情境;但是从有效性上来说,它超越特定情境而具有普遍有效性。笔者倾向于将希尔贝克的三种合理性的概念框架视为情景化理性的一个例证:就其起源而言,当然是来自西方的历史经验,但就其有效性而言,则不限于西方现代性。我相信,这一框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性话语提供新的视角。

[作者郁振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62)。]

^① [挪威]奎纳尔·希尔贝克:《情境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载G·希尔贝克、童世骏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0页。

中国崛起时代如何重新思考现代性

丁耘

现代性与前现代的各文明之间的普遍与特殊,或不如说一与多的关系,是现代思想兴起后的老问题了。此问题不断被提出,这恰恰意味着,人们还没有形成共同的不移之见。本文不拟为众说纷纭再增新议,而是更倾向于,在直接正面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对问题的形态、背景和相应的诸方法论做一宏观的观察。这或者有助于做出较成熟的权衡和抉择。

现代性之一与多的关系,对于现代性在其中最初显露与成熟的文明来说,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对于通过对外关系(无论经贸、外交、战争等)被动卷入另一文明之扩张过程的诸文明来说,这却构成了首要的

号与生活 / 交往方式的生产 - 再生产形式, 同时也取决于物质再生产的形式。

跳过更详细的具体分析, 本文的结论是, 如果允许我们扩大文明概念的内涵, 将生产方式、市场制度等一切物质力量也收入其中, 同时又保存文明之上层建筑意涵与物质力量的差别, 那么现代文明可以被理解为双重的或者说两层的。在其底层, 现代文明的物质动力层, 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为自己创造出经济形式; 在上层, 这种经济形式通过不同方式——社会与市场发生关系的方式、市场对社会的影响和塑造方式——奠基了不同的符号与交往关系形式。现代文明之一元的普遍性, 存在于物质生产这个底层, 这是资本 - 市场 - 技术 - 劳动与经济交换的世界。而现代文明之多元的特殊性, 则存在于符号与交往关系再生产这个上层, 这是伦理、法律、政治以及公共舆论、审美、宗教的世界, 是传统和各种新兴力量的鏖战之地。

这是前互联网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大致情况。中国崛起的时代也正是互联网社会经济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最根本特征是物质、符号和社会交往三者界限之扬弃。移动互联网经济学的本质是赋予这种扬弃以持续的技术动力和经济形式。物质生产成为高度符号性的(最高端时尚的物质产品就是各种符号的使用、接受和发送器), 而符号拥有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力量。符号产物(作品、文本)从未像今天这样赤裸裸地和物质与货币结为一体。社会交往也随之高度符号 - 物质 - 抽象化了。在历史上, 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于柏拉图的囚徒, 他们所面对的“事物”, 无非是符号和影像。^① 随着符号 / 影像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越来越步调一致, 现代文明的单一与普遍就会越来越压倒其多元与特殊。世界各地的文明城市面貌日益趋同, 市民和游客的面貌日益趋同, 昭示着世界历史不仅开始进入了科热夫所谓“普遍同质国家”(universal homogenous state), 而且开始进入了普遍同质的社会关系、空间结构和心理状态之中。在黑格尔哲学那里, 只有绝对才能真正终结历史。如果, 一个集精神(符号、社会与自身批判)和物质于一身的绝对总体有朝一日最终出现, 现代性文明无疑将成为世间唯一的文明。这意味着, 现代文明的真正历史就此开始, 而人类文明的历史将就此终结。

[作者丁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本专题讨论责任编辑: 盛丹艳)

① 参见 [古希腊] 柏拉图:《理想国》, 514-515。

Multi-Modernity and Contemporary China(Symposium)

Gao Ruiquan & Yu Zhenhua & Ding Yun

Abstract: Gao Ruiquan holds that the concept of “multi-modernity” is a necessary premise for “China’s modernity”, which include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most direct requirement is to understand the forming of “China’s modernity. The studies on “China’s modernity” must be a multi-disciplinary one. Yu Zhenhua discusses a cognitive dimension of modernity and believes that in the framework instrumental reason, explanation reason and argument reason, ther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China’s discourse of modernity, as there is a balanced view between oneness and diversity, and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Ding Yun points out tha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could be understood as of being two-strata, and its lower stratum is for universality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its upper stratum is for particularity of the re-production of sign and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time of Internet, the oneness and universalit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will increasingly overwhelm multiplicity and particularity.

Key word: modernity, universality, particularity